

郑永年专栏

亚洲秩序出现了什么问题？

近代至今，我们所经历的亚洲秩序，与其说是亚洲秩序，倒不如说是西方（先是欧洲、后是美国）秩序在亚洲的延伸。近代以来，相比步入工业化阶段的西方国家，大多数亚洲国家显得贫弱，纷纷沦落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，包括印度大陆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，中国则沦为了毛泽东称为的“半殖民地”国家。

19世纪中叶，面对欧美对亚洲的军事扩张，日本以宫崎滔天、胜海舟等为首的知识分子，开始提出“亚洲主义”的观点，主张以唤醒亚洲、共同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“亚洲同盟论”。这个观点在后来也深刻影响了孙中山。孙中山在1920年代提出的“大亚洲主义”中的很多观点，出自日本早期的“亚洲主义”观点。早期的“亚洲主义”观点主张亚洲各国家的平等和合作，但这种平等合作的“亚洲主义”观点，很快被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福泽渝吉所倡导的“脱亚入欧论”，导向以赞赏西方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式做法，以及提倡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“大亚洲主义”的错误主张。

这样，日本早期“亚洲主义”迅速异化，从“联亚”“兴亚”走向了“脱亚”“侵亚”，并最终演变为企图用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方式，来建立亚洲秩序的“大东亚共荣圈”战略，为亚洲国家带来战争和灾难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日本也从一个亚洲国家的骄傲者（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。在日俄战争中，日本打败俄国，这是第一个亚洲国家打败了一个欧洲国家。当时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都感到欢心鼓舞），成为了亚洲多数国家的侵略者。

二战期间，日本被打败，西方顺利地确立了西方秩序。尽管中国也参与了战后亚洲秩序的重建，但无可否认的是，战后亚洲秩序的重建是以美国为主导的。二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亚洲秩序受战后所形成的冷战秩序主导，亚洲国家分属两个敌对阵营。冷战结束以后，尽管亚洲国家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，但是冷战所形成的亚洲秩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体，冷战时期的各种同盟关系，特别以美国为主导所建立的各种反社会

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依然持续。

可以说，今天亚洲秩序所面临的各种问题，也是冷战框架之下的亚洲秩序的遗产，是西方干预的产物，包括南北朝鲜分裂、中国大陆与台湾分裂、中国和印度边界（西藏）问题、中日间的领土争端、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等。

亚洲秩序是以美国为核心、以美国与其同盟为支撑点的。美国的同盟有双边的、也有多边的，包括美日同盟、美韩同盟、美澳同盟等，美国也与其他一些国家结成了准联盟。美国联盟体系内所有国家的安全，是美国安全体系的延伸。

在中国崛起之前，日本很长时间里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，但日本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，至少在外交层面没有完全的主权，而深受美国的制约。中国尽管在崛起，但迄今中国主要还是接受、适应的过程，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。今天，随着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国力的增长，这些大国是时候应该也可以在亚洲秩序重建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。

亚洲秩序发生大变化

也就是说，目前，二战之后所形成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亚洲秩序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。对亚洲国家来说，巨变既是挑战，也是机会。变化的根源是多元的，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。

第一、美国的相对衰落。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尤其在军事方面，但较之其辉煌的过去，美国的确相对衰落了。美国的衰落主要源于美帝国的过度扩张，这是自克林顿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所公开承认的，过度扩张导致美国力不从心。此外，苏联解体之后，美国没有明显的“敌人”。在整个冷战期间，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集团面临一个公开的敌人，那就是苏联。

为了应付一个扩张性的苏联，美国的盟友愿意为美国“买单”，减少美国做世界警察的成本费用。苏联解体之后，尽管亚洲国家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，但是冷战所形成的亚洲秩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体，冷战时期的各种同盟关系，特别以美国为主导所建立的各种反社会

盟友的“敌人”的情况下，美国盟友没有意愿为美国“买单”，这使得美国维持其亚洲霸权的成本很高。

美国实际能力的相对衰退，影响着美国统治集团继续做世界警察的意愿。特朗普一上台，很快就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（TPP），这并非没有充足的理由。尽管美国不会放弃亚洲，未来美国甚至有可能再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，但其影响力很难维持在不变的水平，总体来说是下行的。

第二、中国的崛起。中国的崛起，尤其在亚洲的崛起，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。在西方列强到达亚洲之前，中国在亚洲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、被称之为“朝贡体系”的亚洲秩序。这个体系并不像西方的盟友体系，没有进攻和侵略性，意在维护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“最低秩序”，并且只侧重于贸易。西方的到来很快导致这个传统秩序的解体，中国本身也成为西方的受害者。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完全改变了这个局面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、最大的货物贸易国、最大的外汇储备国。光是中国的经济崛起，也已经对亚洲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。

简单地说，至少在经济领域，亚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。中国和东北亚、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互相依赖度非常之高，并不比欧盟国家之间或者北美国家之间低。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（例如年增长率达到5%至6%），那么一个自然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秩序的形成变得不可避免，军事崛起也是显然的。这些年，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崛起感到“忧虑”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外在影响力。

第三、亚细安的局限性。亚细安形成于冷战期间，是一个松散的组织。冷战结束之后，亚细安大扩张，从原来的六国扩张到10国。同时，亚细安努力成为所有大国都能在此互动的区域平台。不过，这个平台内部的整合已经遇到严重的瓶颈。从理论上说，各国都非常愿意走向更紧密的整合，但在实践层面则

困难重重。在和其他大国互动过程中，亚细安更感觉到其弱处，那就是亚细安很难对其他大国产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，主要是中美两国，未来还有印度。近年来，中美两国都已经证明各自都有能力分裂亚细安，但从各自的利益出发，无论美国还是中国，都决定让亚细安维持整合状态。

“经济”和“安全”不协调

第四、“经济”和“安全”这“两条腿”的不协调。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，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和中国发展出了深度的经贸关系。不过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安全依靠于美国，甚至是美国安全体系的一部分，这就产生了“两条腿”现象，即“安全”和“经济”。在早期，当中国国家发展的重点在经济的时候，这些亚洲国家的“两条腿”分离并不严重，也就是说，它们在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的同时，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。

不过，现在这些国家的“两条腿”走路战略开始比较吃力。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来自中国，一个来自美国。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国防现代化也在进行。尽管中国并没有要和哪一个国家进行军事竞赛，但因为其经济体量，其正常的现代化也足以在亚洲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。中国的军事崛起对亚洲国家产生安全方面的“忧虑”，因为这些国家的安全是依赖于美国的。同时，中国的军事崛起也要求这些国家在安全方面，至少不能利用美国的力量对中国产生威胁，否则其和中国的经济关系，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

就美国来说，当美国不以中国为敌的时候，也就是中美关系稳定的时候，这些国家的“两条腿”走路策略不会有重大的问题。问题在于，美国不时地想把中国塑造成为其“敌人”。如果中美关系转坏，这些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，“两条腿”走路的条件就消失了。近年来的南中国海问题和今天中美之间有可能爆发的贸易战，都对这些国家产生着莫大的压力。

第五、区域秩序的出现。到目前为

止，区域秩序主要出现在经济领域，包括三个“10+1”机制（即中国—亚细安、日本—亚细安、韩国—亚细安），及其“10+1”基础之上“10+3”。在中亚还存在以反恐为核心的“上海合作组织”。不过，其他一些涉及区域外大国的组织，包括“东亚峰会”和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”的运作，并没有实现当初人们对它们抱有的高期望。这些组织是各国领袖互动的平台，但并没有促成区域的进一步整合；在很多时候，反而对区域整合产生阻碍作用。

所有这些发展趋势，都为建立一个自主但开放的亚洲秩序，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和制度条件。一个自主开放的亚洲秩序对亚洲国家的重要性，尤其是大国的重要性，是不言而喻的。一个自主开放的亚洲秩序可以定义为：这个秩序以亚洲国家为主体而构造，但不排挤其他国家。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，在亚洲都有重大的利益。同时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本身，都和西方有重大的利益交往。因此，不仅很难排挤掉西方的利益，而且没有任何必要去排挤。

就是说，亚洲秩序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秩序。前面所讨论的日本的历史经验需要吸取。尤其在全球化时代，讨论谁排斥谁已经变得没有多少意义。尽管这些年来，全球化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，但不管反全球化力量如何强大，未来的社会不可能倒回到从前主权国家之间很少往来，或者不交往的时代。

不过，美国和西方利益在亚洲的存在，或者说不排挤美国和西方的利益，并不是说亚洲国家不能作亚洲自主秩序建设的努力。新出现的机会不能浪费，否则永远不会有一个自主的亚洲秩序。对中国、印度等大国来说尤其如此。今天，亚洲的大国包括中国、日本、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，这些国家的努力决定了亚洲是否能够形成一个自主的亚洲秩序。尽管这些国家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和主导的亚洲秩序，但大国必须在倡议这样一个亚洲秩序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。大国不倡议、不努力，小国家即使有强烈的意图，也很难有能力去做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
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